

西方哲学东渐百年：回顾、反思、展望

海峡两岸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综述

邓晓芒/文

2002年9月18日—20日，由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和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所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西方哲学东渐百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举行。这是国内首次对西方哲学东渐刚刚过去的百年行程进行回顾、反思和展望的学术会议，也是海峡两岸西方哲学界学者的首次聚谈。来自台湾佛光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海大学等六所高校哲学系所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世界哲学》编辑部等十几个大学和科研出版单位的40多位专家教授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百年来西方哲学东渐的曲折历程、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影响作了回顾与反思，并就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全面推进西方哲学东渐事业进行了探讨。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对西方哲学东渐的曲折历程的回顾和对某些珍贵史料的清理

学者们对西方哲学东渐的时间和过程以及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学说传入中国的始末进行了考查和清理。有学者认为，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应从16世纪末（1582年）利玛窦来华算起，接着有金尼阁、汤若望、傅汛际等人，他们作为传教士，在带来西方的天算知识及其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的同时，通过与中国学者结成朋友、译介学术著作而使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开来。到了18世纪，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西文化交流中断。而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东渐应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严复为代表的翻译家率先将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算起，迄今100年左右。在这个西方哲学东渐的早期，严复、梁启超、蔡元培、马君武等人功不可没。学者们还分别追溯了百年来古希腊哲学、斯宾诺莎哲学、卢梭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哲学诠释学、罗尔斯和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等在中国的遭遇和发展脉络，对百年来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主要哲学家和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史上一些主要概念如哲学、存在、自由、启蒙等的来历进行了考查；对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西方哲学东渐上所做的贡献进行了回顾。此外，学者们还透露了一些非常珍贵但鲜为人知的史料，例如，张东荪用小楷誊写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底是他自己翻译的还是蓝公武翻译的抑或是和蓝公武合译的？有的学者认为根据译文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张东荪个人所译，那么他当初和蓝公武之间的合作协议是怎么回事？20世纪2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资请罗素在长沙讲学时，作记录的居然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对罗素的哲学如何看待？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套汉译西方哲学名著之艰难；顾寿观先生的治学精神以及在斯宾诺莎的《简论上帝、人及心灵健康》一书的译本出版问题上的谦让；郑昕先生的康德情结；严群先生的柏拉图情结；苗力田先生的斯宾诺莎情结等等。学者们一致认为，清理、保存下这些史料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是一项“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必须由海峡两岸共同建立一个“哲学馆”来收藏这些史料。

二、对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被理解、接受、消化过程中出现的误解和偏差及其原因的反思和探寻

这方面的问题是探讨得最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百年来，中国人在学习和接受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误释和偏差。有的学者历数了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它们是：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选择性接受；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活剥；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中国化；牟宗三对康德的误读；对“理性”概念的普遍误解；对“科学”的实用化；对“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对“实践”概念的变形；在“存在”概念上的分歧；对“自由”概念的附会。这种种错位都是用本民族文化传统模式去扭曲和附会西方哲学的诸多理论和概念的结果，当人们自以为掌握了西方哲学的本质内核时，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本民族固有的思想中转圈子。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讲主客模式但忽视了主体性；强调认识而轻视情感和意志。今天西方哲学在自省过程中批判过分强调主体性转而重视主客融合，但这是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与中国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不同，这是应当加以区别的。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启蒙”概念与西方的启蒙完全不同，是用“扫除愚昧”取代了西方的自由思考和思想宽容。有的学者谈到，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正常程序应该是释、译、论、用，但卢梭哲学在中国却经历了刚好相反的程序，是先用、再论、然后是译、最后是释。如此等等。

学者们认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和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国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气候，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等等，此外还有语言上的障碍和西方有的哲学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等。因此，有些误解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对卢梭思想的用、论、译、释及孙中山、梁启超、邹容等人对他的误解，就可以归因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对革命的预见与期待和卢梭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中国人重实用的传统和急功近利的文化心理；有的学者指出，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的被歪曲和一冷一热的遭遇也足以见得当时哲学是政治的婢女；还有的学者认为，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时，重视的是以几何学、逻辑学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并且试图将之应用于研究自然和人事，达到“度数旁通十事”，即将演绎方法和经验结合起来。但同代和后世的知识分子漠视这一点，他们从西学中看到的是数学的应用价值，而没有认识到徐光启大力推崇的科学方法论的价值；他们从西学中看到的是实用科学的价值，而没有

认识到将数学方法和经验科学结合起来的价值，从而使中国人在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中与现代化擦肩而过。这一历史事件也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想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作祟。

三、关于百年来西方哲学东渐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的考查

台湾学者的报告主要集中在在这方面。学者们认为，中西文化遭遇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哲学东渐使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异化”的现象；另一方面，西方哲学东渐也令中国哲学研究者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中国哲学的不足，并从西方哲学中得到启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所助益，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有的学者指出，西方哲学东渐后，很多人都理所当然地用西方的观点与方法来解析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体系来衡量中国哲学，从而说中国哲学有逻辑性不足、体系不完备、概念不清楚等毛病，更有甚者，使中国哲学中一些传统的术语的使用都失去了正当性，直至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中西哲学的不同常常被解释成进化阶段的不同。这是一种文化被殖民主义的心态。这是削中国哲学之“足”去适西方哲学之“履”，是邯郸学步，失其固步，最终导致中国哲学的“异化”。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因为不断重新解读自己的传统，重读古希腊，从而推陈出新，并没有强调要会通东方来提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哲学在现代的道路就在于应切实反省过去不恰当的“现代化”作为，老老实实“归而自求”，好好清理自己的学术传统，不以他人的眼光视己，以致自惭形秽。唯其如此，东西双方才能共同构建一个平等对话的情境。有的学者指出，部分西方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等人主张哲学属于西方而否定有中国哲学，这固然有西方中心乃至文化沙文主义的偏见，但是部分中国哲学家如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等人肯定有中国哲学的方式，是从西方的传统中找出一些范畴和语言来阐明中国哲学，即以西方这种哲学或那种哲学来构建中国哲学，这也只能使中国哲学永远存在于解读与诠释中，存在于建构中。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并不反对以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我们在诠释时，必须检讨这些概念是否适当。在当代中国哲学诠释中，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基本概念——实体形上学，即在诠释中国哲学时，早已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在形而上学方面，基本概念是实体性（substantiality），也就是一个在其自身（in itself）的实有（reality）。在这个预设下，中国哲学的天或道被诠释为最根本或最终极的实体。人是宇宙中另一个有心灵的实体，而事物是具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宇宙是由各种不同的实体构成的，即使它们有其他的性质，如天的创造性，《孟子》的人心的四端活动，事物的运动（阴阳变化）等，都是基于实体而来。但是，用这种实体形上学的方式诠释儒家和庄子的哲学会导致困难和矛盾，使儒家和庄子的文本无法提供一致完整的真理，否定了它们作为经典的价值。而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启发下，特别是在他的光的形上学（metaphysics of light）这个概念的启发下，中国哲学的一个可能的诠释是功能形上学，即，道是显示性，它是一个自我显示的过程或原则；人是开放性，他是一个向道和万物开放的心知。无论道和人，他们的本性是各自的功能，这就是所谓功能形上学。它可以解释实体形上学所导致的困难。学者们一致认为，今天，中国哲学在对待西方哲学上要有健康的心态，要两面作战，既要反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文化被殖民主义。要建立中西文化会通的平台，交流不应单向、片面，而应该双向、平等。要正确定位本民族文化，利用外来文化促成中华文化的转型，而不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障碍。

四、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西方哲学东渐事业全面推进的问题的设想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哲学东渐一百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两种文化格格不入、互相排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阶段，两种文化互相求同和比附、猎奇式的“新瓶装旧酒”阶段，发现同中之异、以“陌生化”的眼光去理解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从而开始真正的融合阶段。现在第三阶段才刚刚开始。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上所出现的种种偏差是必然现象，因为从解释学上讲，没有前见就不能被理解。但是，今天要想将西方哲学东渐事业推进一步，就必须认真反思各种误解，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接受和诠释西方哲学。有的学者认为，今天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应该不落入传统的唯物和唯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窠臼，必须重视西方各种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宗教背景，否则有许多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的诠释。许多学者认为，对西方哲学的误解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翻译上的不理想。因此，经典文本的翻译非常重要。有的学者论述了翻译学的本质，提出今天要建立理性主义的翻译理论。认为现代的翻译要考虑语言学 and 诠释学的发展；翻译的全过程要拓宽，不能只考虑文本和译者，而应该是一个翻译“场”。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处于频繁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与诠释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关键。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经典有不断重译的必要，因为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古文今释的需要；第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在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不仅要把外来经典翻译成本民族语言，而且要把本民族经典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第三，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有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诠释。“翻译须理解，理解即重建”，“我们能比柏拉图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因此，虽然彻底的、尽善尽美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他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有的学者对翻译持悲观态度，认为应该重视读原文。此外，学者们还对 *ov* (being, sein), *idea*, *ontology*, *politics* 等术语的翻译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诸如此类的术语应该重译，因为传统的翻译不够准确，容易产生歧义；多数学者认为，重译应充分考虑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不能仓促从事。学者们一致认为，为了将西方哲学东渐事业推进一步，目前立刻可以着手做的是统一译名和术语（包括大陆的统一和海峡两岸的统一），并且讨论了具体的方法，包括译名第一次出现时注出原文，书后附上译名对照表，告诉自己的学生用哪一个固定的译名，出版一本西方哲学译名术语词典等等。有的学者在谈到今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时提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在跟西方，从跟马克思到跟尼采到跟海德格尔，今天，施特劳斯重新检讨西方哲学史之后，中国西学界是否还要跟进？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就是政治哲学，中国跟施特劳斯是一定的，而且这种跟的势头已经初现端倪。如果不承认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就是虚无主义，施特劳斯就不是问题，否则，施特劳斯是无法跨越的。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其实是涉及及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性人格的问题。在参与政治变革的乐观主义和转回内心的悲观主义之间，还有转回内心的乐观主义这一第三条道路。中国当前的政治哲学热，正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哲学自身的本质还没有参透。关于如何推进西方哲学东渐事业，还有的学者指出，今天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推进西方哲学东渐事业的好时机。要想推进西方哲学东渐事业，第一，必须营造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如此；第二，必须恢复健康的心态。第三，必须提高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而只有将专题研究与综合性探讨结合起来，将西方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西方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作到这一点。

这次会议气氛热烈，安排紧凑，论题集中，学术性很强。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将集结出版。

（责任编辑：鲁旭东）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8519507 传真：(010)65137826